

《瞻对》：关于非虚构文本的人类学见解 郑少雄

“非虚构”在中国的可能

当下中国“非虚构”写作在2010年前后由《人民文学》杂志倡导出场，区别于“虚构”，也区别于传统意义的“报告文学”。

而现在“非虚构”显然已经出圈，大众传媒把所有标榜“记录”的都增容到“非虚构”之中，包括日志、真实故事、素人写作、短视频等等。

在“非虚构”被增容和泛化的当下，需要重新回到2010年前后倡导“非虚构”写作的问题意识和精神原点，在“非虚构”的汪洋大海中澄清和强调有现实主义精神和审美创造的“一种”非虚构。

更重要的是，以文学而论，被寄予厚望的“非虚构”能不能凿穿文学和中国现实秘道？能否有更大的空间和可能？所谓中国“非虚构”既指当下中国现场，也是指一种进入中国现场的实践性文体；而“非虚构”中国强调的是立场和路径，就是以“非虚构”这种直面现实方式来把握、理解当代中国。

——主持人 尹闾

个人生活史的写作实践

李依蔓，个人生活史叙事平台“三明治”主人。



10年前，三明治还是一个独立媒体平台和创新人群社群，三明治这个名字来源于“三明治一代”（The Sandwich Generation）这个发源于美国的文化概念。

10年前，30岁左右人群出生于1980年左右，他们的成长伴随着1978年改革开放的进程，之后是国企改革或企业重组引发“下岗潮”，“铁饭碗”整齐划一和稳定的生活方式成为过去。

因此对于他们而言，可以选择相对安稳的生活，努力建立和维护“三十而立”的传统中产身份，但所受的教育和全新的社会环境又让他们不甘于此。

最初4年，个人生活史写作的实践主要通过三明治独立媒体团队来完成。我们用人物报道、新闻特稿的方式，记录30岁上下人群探寻自我、生活创新和进行困局突围的真实故事和深度文化观察。

从2015年开始，三明治的个人生活史书写实践从狭义的“我们写”变成了更广义意义上的“我们写”，倡导每一个珍视文字和写作的普通人来写。

我们通过这些写作者看到了更多元和丰富的中国面貌。有关于时代和社会的，比如中国人如何在非洲卖手机、缅甸华人的真实生活状况、一位跨性别者如何找到装在男性身体中的女性；有关于年轻人生活选择的，比如两个年轻人决定合作生养孩子但不结婚、网络女主播的爱恨江湖；有关于家庭的，比如一位酗酒的父亲、一位和阿兹海默症斗争的婆婆、一个家庭20年的下岗人生。

然而写一篇达到一定完整度的作品，对于未经过专业文学训练的写作者来说，是有一定挑战的。于是我们推出了更轻盈的、侧重社交的写作项目——每日书，每天记录300字，连续写30天。

写作项目短故事学院，由编辑和写作者一对一地进行沟通并指导，帮助每一个想写自己的真实经历和故事的写作者，把一个想法落地成一个好故事。

在三年来发表的短故事作品中，我们得以更系统地窥见当代中国人真实的生活和精神面貌，也有许多隐而未见的故事浮出水面。很多时候我们都会为作者们自我袒露和剖析的勇敢和坦诚所震撼。

我们是怎样的一代人？在一个什么样的社会环境中生长起来，受到了怎样的影响？面临着哪些困境？在三明治过去几年记录下的故事中，我们得以窥探到一些痕迹。

比如和10年前相比，出生于独生子女政策下更年轻的一代人，似乎拥有更优越的物质条件、社会资源，有更多选择机会和可能，但他们更多地陷入一种原子化的孤独，他们面临着更强大的控制，这种控制来自于家庭，也来自于更强大、更无孔不入的资本和商业渗透。

写作者们在文字中展现出强大的自省感知力，通过书写去重新构建关于自我和生活的意义，去触发更多的行动可能。这些故事就是鲜活跳动着时代脉搏。接下来，我们希望通过一些社会学、人类学的研究方法，以及个人生活史书写实践，继续对这一代三明治的心灵图景进行研究和分析，去不断提出问题，并尝试作出回应。

每一代人，都一定会找到和当下时代交手的方式。这一代人年轻人也会找到不同可行的、好用的方法和路径，去达成对自我的梳理、确认、接纳，去和他人建立更深层次的理解和连接，去生成更持久、更有意义和影响力的社会行动。

我们看见自己在时间之河中身在何处的锚。

郑少雄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。



作为一名人类学者来讨论“非虚构”写作问题，和学科间相互启发的需要有关，也可能是因为我最近几年在关注阿来的写作。

《瞻对》是阿来最著名的一部非虚构作品。2013年《人民文学》非虚构大奖的颁奖词说：“作者站在人类文明的高度去反思和重申历史，并在叙述中融入了文学的意蕴和情怀。”这段话涉及了“历史”与“文学”两个关键词。

从长篇小说《尘埃落定》到非虚构作品《瞻对》，在阿来笔下，康区土司除了在小的尺度上，相互之间合纵连横、征战杀伐外；在大的尺度上，既有依赖、协同内地征剿西藏的一面，也有与西藏联手，共同对付清廷和民国政府的一面。

阿来用近似纪年手法记述了清廷发动的七次瞻对战争。从乾隆开始，就要依靠西藏地方政府助战，到了全书用力最著的贡布加叛乱时期，更是依靠藏军才最终平息，因为支付不起西藏军饷，而把瞻对赏赐给西藏，在康区地面上形成了犬牙交错的政治局势。

非虚构如何书写城市

吕正，《萌芽》编辑，澎湃新闻“上海相册”项目特约编辑。



“非虚构”在中国这些年经历了横空出世到遍地开花的过程。这个过程就像大家以前喜欢看《动物世界》，人们在电视机前——隔一个安全距离看动物们厮杀、捕猎，一个画外音平静地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。

“上海相册”是一个很新的非虚构项目，首季创作在2020年8月间刊发完毕。在参与这个项目之前，我刚结束在“武康大楼口述史”项目的工作。

“上海相册”的摄影师徐昕的摄影作品“the Metropolis 大都会”。“上海相册”一共找了22位上海在地作家，根据22位上海在地摄影师每人一组的摄影作品进行创作。

的人类生态。而口传资料对贡布加传奇的反复强化，反映出来的现实是，在国家政治一体、藏区文化相似性之下，中心与边缘、民间与庙堂、朴素特质与文明教化之间的辩证距离。

理解非虚构写作需要分辨事实、真相和现实。王明珂指出，事实是真实存在的；真相是为事实所做的注解或进一步的描述，是事实与现实之间的交错关系。

一直以来，许多评论者都纠结于阿来身份的复杂性和模糊性。但评论者未必注意到的另一个维度是，阿来的身份认同也在发生变化。

进一步说，就论与“非虚构”最直接相关的事实层面来看，叙事尺度的选择会产生完全不同的历史结果。在纪录片《文学的故乡》里，阿来说自己连导演都不算，最多只算是舞美师。

总而言之，就如海登·怀特提出的“作为文学虚构的历史文本”，或者后现代人类学所反思的“作为诗学与政治学的民族志”，既然历史学人类学都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关于真实性的质疑辩难之中，我们对文学非虚构与否的关注，可能更应该落脚在共情地理解文本背后的作者面对何种真相与现实、尝试传递何种历史观念上。

吕正

凉，几年后或许就是平地起高楼，或许就是灯火通明，就是交通拥堵。而过来人多半只会感慨昔日的苍凉，不会去怀念它。

从我自己的角度来看，我觉得首先是“有趣”。几乎每个参加这个项目的作家、摄影师都是抱着这样的态度来尝试；其次是“距离感”，因为作家之前并没有看过这些照片。

2018年的上海双年展项目总协调、策展人施瀚涛先生谈到他对这个非虚构项目的理解，他觉得作家并不是以“评论”的视角去看摄影作品，而是从“创作者”的视角进行再创作。